

· 蜀学研究 ·

## 宋代三苏的史论

粟品孝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宋代三苏文史兼长,史论作品极为丰富。史论是三苏史学的重心所在,主要包括史事评论和史学评论两部分,前者以观风察势为核心,以借古鉴今为目的;后者以苏洵的经史观、苏轼的正统论和苏辙评论《史记》最著名。三苏史论在形式上笔势纵横,议论横生,在内容上喜言得失成败,罕及纲常伦理,与理学家的论史尺度迥然不同,不仅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在宋以降的历史长河中亦有很大的影响力。

**关键词:**宋代;三苏;史论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10)01-0001-06

## The Three Sus' Historical Reviews

SU Pin-xiao

(School of History &amp;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Three Sus talented at both history and literature created plenty of historical essays. Their essays are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critique on historical events and critique on historical studies. The former lays stress on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events aims at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past while the latter is famous for Su Xun's view of historiography and Confucian classics. Su Shi's orthodox theory and Su Zhe's commentary on Shiji. All of their reviews were written magnificently and wittily in style and comments discussing the gains and losses seldom dealing with cardinal guides and constant virtues which meant the Three Sus' yardstick of historical critique wa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neo-Confucians. This yardstick not only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but also had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thereafter.

**Key words:** the Song Dynasty; the Three Sus' historical essays

宋代眉山苏洵与苏轼、苏辙父子,号为三苏。自宋以下,世人多以文章许之;以致长期以来,他们在史学方面所展现的才华和所取得的成就少为人知。然而三苏的史才,在当时和后世都为不少有识之士看重。北宋时人雷简夫见苏洵《史论》,以为“真良史才也”<sup>[1]</sup>;王安石欲参酌裴松之注重修《三国志》而不能,晚年则谓:“非子瞻(苏轼),他人下手不得矣。”<sup>[2]</sup>南宋朱熹对苏辙《古史》颇为称许,赞叹说:“近世言史者,惟此书为近理。”<sup>①</sup>不过三苏最倾心和最有成就的,并非著史与考史,而是论史。苏辙自己晚年回顾其家学时就说:“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sup>②</sup>苏轼也自谓:“及壮大,不能晓

习时事,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sup>③</sup>验之于三苏作品,史论文章确实占有相当篇幅,史论是三苏史学的着力所在。关于三苏的史论,文史学界都有所留意和初步研究<sup>④</sup>,但未发之覆尚多,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 一、主要作品

三苏的史论作品极为丰富。苏洵有总体探讨史学观念的《史论》三篇,他在引言中述其所作原因时说:“史之难其人久矣。魏晋宋齐梁隋间,观其文则亦固当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两汉无敌,史之才宜有如(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辈,而卒无一人可与范晔、陈寿比肩。……吁!其难

收稿日期:2009-12-25

基金项目:四川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协调小组重大项目“巴蜀文化通史”子课题“史学卷”(第13号)。

作者简介:粟品孝(1969-),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宋史。

而然哉。夫知其难,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论》三篇。”<sup>⑤</sup>表明苏洵具有成为良史之才、重振史学辉光的高度自觉。而具体展现苏洵论史才华并为其赢得巨大声誉的,则是其《几策》、《权书》、《衡论》等三组共 20 余篇史论。文史兼长的欧阳修获读这些文章,赞不绝口,以为“辞辩宏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sup>⑥</sup>。另外苏洵还撰有《谏论》上下篇、《誉妃论》、《管仲论》、《明论》、《孔子论》等史论性作品。

苏轼的史论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较之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最为精粹的部分主要收在中华书局点校本《苏轼文集》卷二至卷四中,共有 40 多篇,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论历代人物,包括论先秦人物的《伊尹论》等 21 篇,论秦汉人物的《秦始皇帝论》等 12 篇,论三国人物的 2 篇,即《魏武帝论》、《诸葛亮论》,论唐代人物的 1 篇,即《韩愈论》。从中可知苏轼所论人物的重心在先秦秦汉时期。二是论历史事件,包括《论郑伯克段于鄢》等 6 篇。其他的还有 10 余篇,包括反映其史学正统观的《正统论》三首。除这些作品外,在《苏轼文集》卷六十五中,还集中收有苏轼 90 多篇“史评”,涉及众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大体也属于史论性作品。不过有的并非苏轼所作,如《历代世变》一文纵论古今世事,颇得后世推重,明代袁黄、王世贞所编历史教科书《纲鉴合编》,就在卷首《读纲鉴法》中载录此文,且与程颐、朱熹等理学名儒的读史方法并列;近来有学者分析苏轼史论,还特加征引,说其“将苏轼深湛的史学功力表露无遗”<sup>[3]</sup>。不过据笔者考证,此文乃是程颐的作品,并非苏轼所作<sup>[4]</sup>,今天不可据此考论苏轼的史学思想。

苏辙的史论作品也很多,单篇的就有 70 余篇传世,主要包括《历代论》45 篇和《应诏集》所收的 28 篇。这些史论中,以人物为题的最多,计有 46 篇,包括从先秦的尧舜到五代的冯道共 50 多位历史人物;以朝代、时代为题的也有 12 篇,上起三代,下至五代,如《夏论》、《六国论》、《五代论》等;以地理区域或边疆民族为题的有 6 篇,如《蜀论》、《西南夷论》等;其他的还有 10 篇,如《兵民》、《王者不治夷狄论》、《史官助赏罚论》等。这些史论的内容时间跨度长,论题范围广,关涉宋以前不少著名人物和重大事件。苏辙对这些史论相当自负,曾上书朝廷重臣曾公亮说:“有《历代论》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于五代,治乱兴衰之际,可以概见于此。”<sup>⑦</sup>另外,苏辙

还专门针对司马迁《史记》而著成《古史》一书,“记伏羲、神农迄秦始皇帝,为七本纪、十六世家、三十七列传”,其中“于得失成败之际,亦备论其故”,即在本纪、世家、列传一篇终后,以“苏子曰”发论,比较集中地展现了苏辙的论史才华,“充分体现出苏辙的历史思想和政治思想”<sup>[5]</sup>,也是一系列重要的史论作品。

## 二、基本内容

一般说来,史论就是对历史的评论,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史事或历史人物所作的评论,即史事评论;二是对史学、史书或某种史学现象、史学思想的评论,即史学评论<sup>[6]</sup><sup>165</sup>。下面就分别从这两方面来略述三苏史论的主要内容。

### (一)关于史事评论<sup>⑧</sup>

1. 以观风察势为核心。本节开头所举苏轼“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一语,集中概括了三苏史事评论的核心内容。所谓观风俗之变,就是从历代社会风尚的变化入手,考察社会历史的运动和发展。

苏洵认为,从尧舜至三代,社会风尚发生了巨大变化,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一代有一代的时风。不仅如此,“尚文”之风还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大“势”,他说:“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而入于文,其势便也。及夫文之变,而又欲反之于忠也,是犹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sup>⑨</sup>苏辙也观察到这种变化,他说:“予读《诗》、《书》,历观唐虞至于夏商,以为自生民以来,天下未尝一日不趋于文。”这里所谓的“文”,是与“野”相对的,可解为文明、文雅,核心是封建的伦理道德秩序,所以苏辙说:“文之为言,犹曰万物各得其理云尔,父子君臣之间,兄弟夫妇之际,此文之所由起也。”而且,同父亲一样,苏辙也认为“尚文”乃是大“势”所趋,他说:“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渐而入于文,至周而文及于天下。当唐虞夏商之世,盖将求周之文而其势有所未至,非有所谓质与忠也;自周而天下习于文,非文则无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势然也。”<sup>⑩</sup>可见苏洵、苏辙父子在讨论社会“尚文”之风时,是从带有客观性的“势”这一角度出发的,看到了社会运动和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必然性。苏轼在观察历史时,有时把这种“势”称作“时”,认为所谓“圣人”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们本身能够创造时势,而在于他们往往能够很好地把握时势的机缘,即:“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

圣人之所以能也，能不失时而已。”<sup>⑪</sup>同样注意到了时势的客观性，“很机智地说明了‘圣人’与‘时’的关系”<sup>[7]</sup>。

三苏不仅对“时势”的客观性已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而且在史论中还以此观点来考察历史盛衰变化之迹。如对于废之已久的井田制，宋人多有复古的梦想，苏洵虽然也认为废井田是现今民生困苦的制度根源，然而由于对时势客观性的了解，他并不赞成恢复这一古制。他看到古代之所以能够行井田是“其所由来者渐矣”，现在若是强行恢复，“其势亦不可得”<sup>⑫</sup>。再如秦废封建、行郡县，乃历史一大变革，后世议论纷纭，唐朝柳宗元认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sup>⑬</sup>苏轼力赞其说，以为此论“当为万世法”，“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sup>⑭</sup>苏辙更进一步指出那些讥讽秦行郡县制的人乃是“惑于其名而未察其势”，“古之圣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观其势，势之所去不可强反，今秦之郡县岂非势之自至也欤！”<sup>⑮</sup>显然，二苏是从古今时势的差异，认识到秦废封建、行郡县乃当时大势使然，后人不可自作聪明，逆势而行。

2. 以借古鉴今为目的。和当时很多学者一样，三苏论史并非为了说古，而是借古鉴今，力图发挥史学的资鉴作用。苏洵《上韩枢密书》就说：“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sup>⑯</sup>

进言之，三苏都撰有《六国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战国时代六国破灭和秦朝兴亡的道理。苏洵重在揭示六国“赂秦”的危害，他说：“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sup>⑰</sup>苏辙则看到战略上联盟对敌的重要性，他分析当时的形势是“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诸侯，故夫天下之重者，韩、魏也。”如果齐、楚、燕、赵四国团结一致共同帮助韩、魏对抗秦国，则“彼秦者何为哉”。然而四国却往往背盟败约，自相残杀，“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sup>⑱</sup>苏轼则从士的地位变化入手，着重分析六国久存而秦却速亡的原因。他认为春秋战国之际，诸侯争相养士，所以“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等到秦统一天下后，“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这样就导致了“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辍耕叹息以俟时也！”<sup>⑲</sup>则士的出路与国家的兴亡大有关联。

这些论述，表面是在探讨历史问题，实际却是在借古论今。北宋仁宗时代，对西夏和辽都采用屈辱

的输绢纳币方式来换取边境的和平。苏洵对此深为不满，在《审敌》一文中明确指出：“天子不忍边民重困于锋镝，是以虏日益骄，而贿日益增，迨今凡数十百万而犹慊然未满足其欲。……夫赂益多，则赋敛不得不重。赋敛重，则民不得不残。故虽名为息民，而其实爱其死而残其生也。”<sup>⑳</sup>他撰《六国论》，以为六国赂秦而亡，就是借以讽喻北宋朝廷对西夏和辽的纳币求和的失策。北宋中叶以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统治者担心士人对政府不满而与乱民结合或是投靠外敌，故而对士人失职现象格外关注。针对这一现实，苏轼撰《六国论》，以为秦之所以速亡，在于士人失职所致，目的也是借以警醒朝廷重视士人出路问题。至于苏辙所论，则是暗讽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却骄奢淫逸，生活腐朽，前后方不能有效协调，团结一致，共同御敌。

宋神宗和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活动，是当时政治上的重大事件。二苏兄弟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常常借史申论。如苏轼在《商君功罪》中写道：“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祸者，吾为之惧矣！”<sup>㉑</sup>这个“后之君子”，明显是暗指王安石及其变法派。苏辙对变法也颇有微词，在史论中亦时有表露。如其《尧舜》篇就说：“世之君子，凡有志于治，皆曰富国而强兵。患国之不富，而侵夺细民；患兵之不强，而陵虐邻国。富强之利终不可得，而谓尧、舜、孔子为不切事情。於乎殆哉！”<sup>㉒</sup>此论更是对朝廷倡导的变法目标与实际措施之间巨大张力的反省。

## (二)关于史学评论

1. 苏洵的经史观。苏洵所撰《史论》三篇，是三苏史学评论中最具影响的作品。其重点是论述儒家经典《春秋》与史书的关系，即经史关系，具体包括三个层面的思考，即义一、体二、相资。他写道：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必曰乱臣贼子惧。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其义一，其体二，故曰史焉，曰经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虽然，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

所谓“义一”，首先是指经书与史书在根本目的

上是一致的,都是“忧小人而作”;其次,二者又同时兼有事、词、道、法四种内容。这是指经、史二者所具有的共性。但经非史、史亦非经,二者在体例上有着显著的区别。“经以道、法胜”,主要目的是要阐释儒家思想的道与法,而“事则举其略,词则务于简”;相反,“史以事、词胜”,表现出来的就是“事既曲详,词说夸耀,所谓褒贬论赞之外无几”。苏洵还进一步分析认为:“经或从伪赴而书,或隐讳而不书,若此者众,皆适于教而已”,所以“经非一代之实录”,与史书是不同的。“史之一纪、一家、一传,其间美恶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数,则其论赞数十百言之中,安能事为之褒贬,使天下之人动有法如《春秋》哉!”所以“史非万世之常法”,与经书有别。这是讲经、史二者的个性,即在体例、作用方面的区别。

经、史这种“义一”、“体二”的特点,必然会导致它们“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的情况。苏洵说:“使后人不知史而观经,则所褒莫见其善状,所贬弗闻其恶实”,即是“不得史而经晦”;相反,“使后人不通经而专史,则称谓不知所法,劝戒不知所祖”。他举例说: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所以为世所重,盖由于二书“虽以事词胜,然亦兼道与法而言之,故时得仲尼遗意”。这说明经、史二者是互为联系、互相资补的。

苏洵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学术流向和史学风气而发的。中唐以来,在啖赵学派的影响下,学者解说《春秋》,不守家法,融合三传。这种新的学术动向发展到宋代,一方面如孙复论经(《春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sup>[8]</sup>;一方面如欧阳修作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偏重褒贬笔削,不重考详史实,他们都没有很好地把握经史关系。而苏洵此论,则比较全面地把握到经史二者的个性、共性和相互的联系,辨证深刻,高出侪辈,故有学者誉之为一时之“绝识”<sup>[8]</sup>。

2 苏轼的正统论。正统论是传统史学的一大基本理论,曾引起学者的长期争鸣。在宋代多个政权并存与儒学复兴运动高涨的时代背景下,有关正统问题的讨论更是达到了高潮。苏轼的《正统论》三首正是这股思潮之下的产物。

在苏轼之前,欧阳修先是撰写“正统七论”,复又删成三篇;章望之不以为然,著《明统》三篇予以驳辨<sup>[9]</sup>。后起的苏轼是欧非章,著《正统论》三首,包括《总论》一篇和《辨论》两篇,发展欧阳修之论,反驳章望之之说。苏轼认为:“正统者,名之所焉而

己。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后名轻。名轻而后实重。吾欲重天下之实,于是乎名轻。”很明显,苏轼将正统问题归结为名实问题,又从重实甚于重名的立场,对以章望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正统论立场进行了批驳。具体说来,苏轼针对章氏讨论三国时期正统归属问题提出的“魏不能一天下,不当与之统”的说法,认为这是迂腐之见,因为历史事实是:“魏虽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无有如魏之强者。”当时三国鼎立,蜀最弱,自不待言,吴也并非魏的对手,“虽存而非两立之势也”。因此力主魏国在历史传承中的正统地位。他还针对章氏提出的“乡人且耻与盗者偶,圣人岂得与篡君同名”的论点,提出:“苟其势不得与之皆坐,则乡人何耻邪?圣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顾其势不得不与之同名,圣人何耻邪?”苏轼这里强调的“势”,就是前面所说的具有客观性的时势。只要顺应了这个客观的“势”,即便是“篡君”,也应该与之正统。即是说:“天下无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汤、武既没,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当时之正而已。”以此推理,五代初期的梁朝虽为“篡君”朱温所建,亦当与之正统。

苏轼这种以三国时期魏国和五代时期梁朝为正统的认识,实际上在于维护北宋政权的正统地位。这虽是北宋正统论争中的主流意见,不足为奇,但其从名实关系的角度进行论证,则具有独到性。

3 苏辙对《史记》的批评。《史记》为古代史学名著,自来多褒扬之辞,但也不时遭来批评之声。苏辙晚年于自传中就说:“司马迁作《史记》,记五帝三代,不务推本《诗》、《书》、《春秋》,而以世俗杂说乱之,记战国事多断缺不完,欲更为古史。”<sup>[10]</sup>他在《古史叙》中进一步阐明了编写《古史》的原委,对司马迁及其《史记》有更具体的批评。

在《古史叙》中,苏辙对于司马迁开创纪传体之功于以首肯:“太史公始易编年之法为本纪、世家、列传,记五帝三王以来,后世莫能易之。”但又认为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家缺乏应有的才识,“其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这一看法固然有苛责之嫌,但苏辙并没有将此简单化地归结为司马迁个人的问题,而是进一步阐明了其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一是当时史学的指导思想不清晰,这是司马迁“浅近而不学”的背景。所谓:“汉景、武之间,《尚书古文》、《诗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于学官,世能读之者少,故其记尧舜三代之事,皆不得圣人之意。”二是当时能够利用的史料也相当有限而且真伪参

杂,这是司马迁“疏略而轻信”的原因。即是说:“战国之际,诸子辩士各自著书,或增损古事,以自信一时之说,迁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传之语以易古文旧说,及秦焚书,战国之史不传于民间,秦恶其议已也,焚之略尽,幸而野史一二存者,迁亦未暇详也,故其记战国有数年不书一事者。”这些看法不无道理。

### 三、特点及影响

三苏史论与同时代其他学者包括巴蜀其他史家相比,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第一,在形式上,三苏史论多笔势纵横,议论横生,极具感染力,从而将古代的史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作者的身份来看,古代的史论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史家之作,“乃史臣于传末作论议,以断其人之善恶”;另一类即非史家之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讹谬”<sup>[9]</sup>。文人论史即属后者。三苏都是大文豪,其史论无疑都是非史家的文人之论。这类史论,贾谊的《过秦论》是其发端,其文波澜层折,姿态横生,把文人论史的个人特点充分发挥了出来。但是,在此之后至于唐代,文人虽时有论史之作,却以就事论事为多,鲜见如此酣畅淋漓的论史文章。而且,遍阅汉魏六朝与唐代散文,除了极个别人相对集中撰写史论,如李德裕留存数十篇论史文章,是唐代文人史论最多的一位,其他文人大多只偶一为之,如韩愈、柳宗元等散文大家也少有史论。至宋代,史论文逐渐增多,一些著名学者如王禹偁、孙复、石介皆有所作,不过文章体貌仍无显著改变。直到三苏崛起,史论文才独成一派气象,其数量之富,立论之新,文采之盛,令世人瞩目,不仅重现如《过秦论》那样腾跃矫夭之貌,而且充分反映出苏氏关于史学、社会、人生诸多独特的认识观念<sup>[10]</sup>。从而将古代文人论史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并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在思想内容上,三苏“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前已引),喜言得失成败,罕及纲常伦理,这与高扬儒家伦理道德的一批新儒特别是一些理学家或偏向理学的学者的论史风格迥然不同。此以唐史为例,苏轼写有《唐太宗借隋史以杀兄弟》一文<sup>⑤</sup>,毫不及太宗启唐室纲常紊乱一说;其《孙武论下》<sup>⑥</sup>论及唐朝时,也仅说“昔唐之乱,始于明皇”,不及太宗与纲常之事。这与同时代的理学名儒程颐和巴蜀史学家范祖禹形成鲜明对比。程颐是著名的理学家,十分重视儒学伦理的阐发,并运用于史学评

论之中,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与范祖禹的史学名著《唐鉴》的密切关系上。程颐有言:“范淳夫(祖禹)尝与伊川论唐事,及为《唐鉴》,尽用先生之论。先生谓门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sup>⑦</sup>,“《唐鉴》议论多与伊川同”<sup>⑧</sup>。考伊川论唐事,如说:“唐太宗,后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识其恶。至如杀兄取位。若以功业言,不过只做得个功臣,岂可夺元良之位?至如肃宗即位灵武,分明是篡也!”<sup>⑨</sup>这与《唐鉴》卷二正“太宗之罪”、卷十一论肃宗叛父正好相符。而《唐鉴》卷十一总论李唐政治:“唐有天下几三百年,由汉以来,享国最为长久。然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更与程颐论“十世可知”时所谓的唐朝“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sup>⑩</sup>的意思完全一致,都是侧重于儒学伦理思想的贯彻和阐发。而三苏的论史风格则与此完全不同。

再如苏辙有《冯道》篇<sup>⑪</sup>,立论与特重儒家伦理的欧阳修完全异趣。欧阳修说:“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sup>[11]</sup>这种观点正好与苏辙开篇就提出的当时的“议者”的论调一致:“冯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议者讥其反君事仇,无士君子之操。大义既亏,虽有善,不录也。”对于这种流行的观点,苏辙不以为然,他认为:“吾览其行事而窃悲之,求之古人,犹有可得言者。”接着用历史上的往事来论证冯道行为的合理性,他举出了管仲不死召忽,晏婴不死齐庄公,二者皆为后人赞许。苏辙认为把冯道和管仲相比,尚嫌冯之功业不足,但比之于晏婴并不逊色,“使道自附于晏子,庶几无甚愧也”。再考察冯道自唐明宗以至后周,虽无赫赫之功,但也并非乏善可陈。像冯道这样生于乱世,做个不与时政的隐士很容易,但与“自经于沟渎何异”。所以冯道的行为,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而在这种情况下,还对冯道加以责难,就有点不近人情了,“如冯道犹无以自免,议者诚少恕哉!”很明显,苏辙根本不同意如欧阳修那样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评价冯道。

由于三苏史论见解不凡,颇具卓识,又纵横捭阖,事理兼备,故而后人誉之为“古今议论之杰”<sup>⑫</sup>。近代蜀学大师刘咸炘更是推许三苏为宋代史学策论一派之宗,他说:“两宋人策论,皆宗苏氏,虽多夸谈,而于其本朝治体则甚明了,为元、明以来所不及。策论虽有短哉,亦有裨于史学也!”<sup>[12]</sup>三苏史论不仅在宋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宋以降的历史长河

中亦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正如近人梁启超所观察到的：“大抵自宋以后所谓史家，除司马光、郑樵、袁枢有别裁特识外，率归于三派。其一派则如胡安国、欧阳修之徒，务为简单奥隐之文词，行其溪刻隘激之‘褒贬’；其一派则苏洵、苏轼父子之徒，效纵横家言，任意雌黄史迹，以为帖括之用；又一派则如罗泌之徒之述古、李焘之徒之说今，惟侈浩博，不复审择事实。此三派中分史学界七百余年。”<sup>[13]</sup>这里虽对三苏史论多有贬辞，但认为其论史风格对宋以后数百年的史论都有重要影响，则是事实。

## 注释：

- ① 朱熹：《朱熹集》，卷 72《古史余论》，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点校本，第 3795 页。当然，从总体上讲，朱熹对苏辙的《古史》是持批判态度的，参见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6—59 页。
- ② 苏辙：《栾城集·后集》，卷 7《历代论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下册，第 1212 页。
- ③ 苏轼：《苏轼文集》，卷 48《上韩太尉书》，中华书局 1986 年点校本，第 4 册，第 1381 页。
- ④ 这方面代表性成果主要有：蔡崇榜：《略谈三苏的史论》，载《文史杂志》，1991 年第 2 期；张元：《苏轼的史论》，载《宋史研究集》，第二十五辑，台北国立编译馆 1995 年版；陈晓芬：《论三苏的史论文》，载《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 ⑤ 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 9《杂论·史论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27 页。
- ⑥ 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见《嘉祐集笺注》附录一，第 521 页。
- ⑦ 苏辙：《栾城集》，卷 22《上曾参政书》，上册，第 483 页。
- ⑧ 本部分主要是参据蔡崇榜老师：《略谈三苏的史论》一文（载《文史杂志》1991 年第 2 期）写成，特此说明。
- ⑨ 《嘉祐集笺注》卷 6《六经论·书论》，第 158 页。
- ⑩ 苏辙：《古史》卷 5《周本纪》，见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语文出版社 2001 年点校本，第 3 册第 400 页。
- ⑪ 《苏轼文集》卷 5《封建论》，第 1 册，第 158 页。此论或题《始皇论中》、《秦废封建》。
- ⑫ 《嘉祐集笺注》卷 5《衡论·田制》，第 134—137 页。
- ⑬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 3《封建论》，国学基本丛书本。
- ⑭ 《苏轼文集》卷 5《封建论》，第 1 册，第 158 页。
- ⑮ 苏辙：《古史》卷 7《秦始皇本纪》，《三苏全书》，第 3 册，第 446 页。
- ⑯ 《嘉祐集笺注》卷 11《上韩枢密书》，第 301 页。
- ⑰ 《嘉祐集笺注》卷 3《权书·六国》，第 62 页。
- ⑱ 苏辙：《栾城集·栾城应诏集》卷 1《六国论》，下册，第 1579—1580 页。
- ⑲ 苏轼：《苏轼文集》卷 5《论养士》，第 1 册，第 139 页。按：此论在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 14 中题为《六国论》，另或题为《战

国任侠》、《游士失职之祸》。

- ⑳ 《嘉祐集笺注》卷 1《几策·审敌》，第 13 页。
- ㉑ 苏轼：《苏轼文集》卷 65《商君功罪》，第 5 册，第 2004 页。
- ㉒ 苏辙：《栾城集·栾城后集》卷 7《历代论一·尧舜》，下册，第 1213 页。
- ㉓ 苏辙：《春秋集解·引》，《三苏全书》，第 3 册第 13 页。
- ㉔ 欧阳修的“正统七论”收录《欧阳文忠公集》卷 59，后删成的三篇则收录《欧阳文忠公集》卷 16，四部丛刊本；章望之的《明统》已佚，但苏轼的《正统论》（载《苏轼文集》卷 4）对其有摘引，可见其大概。
- ㉕ 苏辙：《栾城集·栾城后集》卷 12《颍滨遗老传上》，下册第 1284 页。
- ㉖ 载《苏轼文集》卷 65。
- ㉗ 载《苏轼文集》卷 3。
- ㉘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 11，收录《二程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点校本，第 2 册第 416 页。
- ㉙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 12，《二程集》，第 2 册第 439 页。
- ㉚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 17，《二程集》，第 1 册第 178 页。
- ㉛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 18，《二程集》，第 1 册第 236 页。
- ㉜ 苏辙：《栾城集·栾城后集》卷 11《历代论·冯道》，下册第 1275—1277 页。
- ㉝ 叶适语，见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 3《东坡文》，中华书局 1983 年点校本，第 168 页。

## 参考文献：

- [1] 邵博. 邵氏闻见后录：卷 15[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19.
- [2] 王銍. 默记：卷中[M]. 北京：中华书局，1981：29.
- [3] 张元. 苏轼的史论[C]//宋史研究集：第二十五辑. 台北：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
- [4] 粟品孝.《历代世变》非苏轼所作考[J].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4).
- [5] 张伟. 苏辙与《古史》[J]. 史学史研究，2003(3).
- [6] 瞿林东. 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7] 瞿林东.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M]. 北京：中华书局，1994：71.
- [8] 蒙文通. 中国史学史[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0.
- [9] 吴纳. 文章辨体序说[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43.
- [10] 陈晓芬. 论三苏的史论文[C]//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379—380.
- [11] 欧阳修. 新五代史·卷 54·杂传叙[M]. 北京：中华书局，1974：611.
- [12] 刘咸焯. 刘咸焯论史学·宋史学论[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177.
- [13]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98.

【责任编辑 陈玉兰】